

# 语言研究所六十年

## 本刊特约评论员

语言研究所成立于建国之初的1950年6月。当时根据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关于中国科学院基本任务的指示,语言研究所确定的主要任务包括:调查国内各地方言和兄弟民族语言,特别着重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研究,以及语义发展跟社会经济生活的联系;研究现代汉语的语法,以协助语文教育;辅助识字运动,并协助没有文字的各兄弟民族制定拼音文字方案;用国内各民族语言翻译重要政策法规,以提高各兄弟民族的政治水平。此后不久,国家分别成立了文字改革和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的专门机构(直属国务院的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1952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1956),语言研究所的工作更主要地集中于汉语语言学研究。语言所隶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后,学术追求和发展目标更加明确,目前的研究方向和主要任务是:研究汉语的历史和现状,包括语音、词汇、语法、文字等各分支学科的基础研究;同时加强理论语言学的研究以及语音分析、合成与识别,中文信息处理,辞书编纂,语言文字规范化等语言学科的应用研究。下面就历史沿革和学科发展做简要的回顾,最后是现状和展望。文中涉及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等,均简称为“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不再一一说明。

### 一 历史沿革

#### 1.1 研究所机构设置

##### 1.1.1 中国科学院时期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于1950年6月筹备成立,罗常培任所长(6月5日政务院第33次会议通过任命,至1958年12月逝世);1952年吕叔湘自清华大学调入语言所,1954年底任代理所长,1963年10月任所长。

语言所成立之初设立三个研究小组:(一)现代汉语组,(二)少数民族语文组,(三)中国文字改革研究组。三个组最初的研究任务分别是:现代汉语方面,着重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的研究;少数民族语言方面,重点开展西南和中南地区的调查工作;文字改革方面,搜集相关文献和材料,为拟定方案提供参考。

随着研究工作的细化和深化,这三个研究组慢慢扩充为更多的专题研究小组。

现代汉语组最初既做语法、词汇,也做方言的研究,丁声树是最初的负责人,他主持了1952-1953年《语法讲话》的编写工作。此后这个组专门做语法研究,吕叔湘为负责人。

1953年设立了词汇研究组,开始时重点研究近现代常用词汇的演变,后来开展了构词法的研究,陆志韦为负责人。

1954年成立了方言研究组,丁声树、李荣为主要负责人,主办了九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开展了重点方言调查。

1956年,罗常培、吴宗济等就在民族语言组内开始了语音实验研究,1958年成立了侧重于

机器翻译和语音实验的研究组,重点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生理特性和声学特性。

1956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民族语言研究所,原来在语言所从事民族语言研究的人员傅懋、王辅世、王均等整体转到民族语言所。

1956年成立了词典编辑室,以编纂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为主要任务,吕叔湘、丁声树先后担任编辑室主任。

1957年成立以吴晓铃为组长的宋元词汇组,重点研究关汉卿等元代作家作品的词汇。

1959年以原词汇研究组为基础成立了汉语史研究组,重点是对古代汉语语法做专题研究。陆志韦、郑奠为主要负责人。

1962年,成立了外语研究室,赵洵为主任。其中一组人员在赵洵带领下投入俄汉词典的编写工作,另一组以译介和研究普通语言学理论为主,伍铁平负责。

《中国语文》杂志创刊于1952年,编辑部是语言所一个与研究组室平行的部门。罗常培、林汉达、丁声树先后担任总编辑或主编。

### 1.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时期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吕叔湘任语言研究所所长,1982年12月改任名誉所长。李荣于1982年12月任所长,1985年8月改任所顾问。刘坚于1985年8月任所长。江蓝生于1996年5月任所长。沈家煊1999年1月任所长至2009年5月。

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以后,语言研究所设八个研究室和一个编辑部。至今仍为语言所研究室设置的基本架构。这些部门是:

现代汉语研究室,2001年更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吕叔湘、李临定、郑怀德、张伯江先后任室主任。古代汉语研究室,2001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一室,王显、王克仲、董琨、姚振武先后任室主任。近代汉语研究室,2001年更名为历史语言学研究二室,周定一、刘坚、江蓝生、白维国、曹广顺先后任室主任。方言研究室,李荣、贺巍、张振兴、周磊先后任室主任。语音研究室,吴宗济、林茂灿、孙国华、李爱军先后任室主任。机器翻译研究室,曾改组为计算机室和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后又合并为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刘涌泉、刘倬、姚兆炜、林联合、傅爱平先后任室主任。情报资料室,1980年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1997年更名为当代语言学研究室,冯嘉芳、伍铁平、卫志强、沈家煊、顾曰国先后任室主任。词典编辑室,丁声树、单耀海、韩敬体、陆尊梧、谭景春先后任室主任。《中国语文》编辑部,侯精一、王伯熙、施关淦、林连通、方梅先后任室主任。

### 1.2 学术刊物与学术组织

《中国语文》创刊于1952年7月,从创刊至1962年12月为月刊,共出121期;1963年2月至1966年4月为双月刊,共出20期;1966年4至5月又出月刊两期,1966年6月起停刊;1978年5月复刊以后,至今一直是双月刊。先后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语文杂志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语文》创刊时,办刊宗旨定位于综合性为主,兼顾普及和提高。设有文字改革问题讨论、中国语文研究、语言学著作译述、语文知识讲话、语文教学、语文评论、语文书刊评论、语文笔记、报道、消息等栏目。进入六十年代以后,发表的文章以研究性质的为主。1978年复刊的时候,兼顾语言研究和语文教学问题的讨论,八十年代以后,以刊登研究性论文为主。半个多世纪以来,汉语语言研究许多最重要的学术成果首刊于《中国语文》,这些文章引起的学术讨论和引发的学术潮流深远地影响着汉语研究的发展。目前,《中国语文》是汉语语言学界最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1999—2008年,《中国语文》连续四届获中国

社会科学院优秀期刊一等奖; 2003年,“欧洲科学基金会人文科学标准委员会”用科学方式选出全球 85种引用率较高的语言学刊物,《中国语文》名列三种入选中文类期刊之首; 2005年 1月,获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国家期刊奖百种重点期刊”。吕叔湘、侯精一、沈家煊先后任《中国语文》杂志主编,陈章太、侯精一、徐枢、饶长溶、王伯熙、施关淦、刘丹青、方梅先后任副主编。

《语言研究》创刊于 1956年, 1956-1959年共出 4期。这是由语言研究所编辑、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专门刊物,内容主要是:一,语言科学理论研究;二,现代汉语(包括方言)和汉语史的专题研究;三,国内少数民族语言的专题研究;四,外国语的专题研究;五,有价值的语言研究资料;六,国内外语言学重要论著的评论。吕叔湘、陆志韦、李荣、傅懋、周定一等先后主持编辑工作。

《方言》杂志创刊于 1979年,季刊,由方言研究室编辑。这是我国方言学界唯一的全国性专业刊物。《方言》杂志提倡实事求是、注重调查、相互切磋的严谨学风,强调方言事实的描写和方言特点的挖掘,注意把方言研究从一般描写逐步引向深入探讨,相继发表了一批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学术论文和调查报告,在培养和发现方言研究人才,提倡和引导方言研究方向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海内外方言学界乃至语言学界都有广泛影响。李荣、熊正辉、贺巍、张振兴、麦耘先后任主编,周磊现任副主编。

《语言学资料》是《中国语文》的附属刊物,双月刊、内部发行。1961-1966年共出刊 32期。《语言学资料》对国外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语言年代学、类型学、词源学、语义学、人类语言学、转换生成语法、历史比较语言学等领域都有译介。其中“描写语言学专号”在国内语言学界曾产生重要影响。此刊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介绍国外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刊物。编辑工作先后由刘涌泉和伍铁平负责。刊物的前身是情报资料组编辑的《语言学论文选辑》,1956-1958年共出 8辑。

《中国语文通讯》创刊于 1978年,双月刊,由中国语文编辑部编辑。自 1978年 8月至 1985年 12月共出 45期。主要刊登三类文章:(一)介绍国内各地语言文字的科研和教学情况的文章;(二)选题内容暂时不宜在《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文章;(三)语文工作评论。1986年,《中国语文通讯》扩大版面,内容扩展至语言研究和语文应用的各个方面,改名为《中国语文天地》自 1986年至 1989年共出双月刊 24期。由《中国语文》副主编王伯熙具体负责。

《语言学动态》自 1978年开始出版,1980年改名为《国外语言学》。该刊延续了“文革”前《语言学资料》的传统,全面译介国外语言学理论动向,在八十和九十年代为汉语学界了解国外语言学打开了一扇窗口,产生很大影响。1998年改刊为《当代语言学》后,由原来译介为主转向刊登研究性文章为主。为加强专题和新学科的研究,《当代语言学》先后编辑了 6个专号,分别为“语料库语言学”、“语言与社会——罗常培先生百年诞辰”、“中文信息处理”、“句法研究”、“俄罗斯语义学”和“计算语言学”。先后任主编的有:伍铁平、赵世开、廖秋忠、卫志强、沈家煊、顾曰国、徐云扬、胡建华先后任副主编。

中国语言学会的常设机构设在语言研究所。早在 1957年初,罗常培、吕叔湘等就曾动议成立全国性的语言学会。1980年学会正式成立以后,积极推动语言科学研究,开展全国性学术活动,组织国内学术交流。1980年至今一共召开了 14届学术年会。中国语言学会历任会长是:吕叔湘、季羨林、朱德熙、刘坚、侯精一、沈家煊。语言所直接负责了历届学术年会的组织工作和《中国语言学报》《中国语言学会通讯》的编辑工作。为了加强国内语言学家与国际语

言学界的交往,1988年由语言所负责协调中国语言学会加入了国际语言学家常设委员会,使中国成为该组织的正式会员国。

《中国语言学报》是中国语言学会主办的学术刊物,由学会秘书处负责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学报》为每一届学术年会上提交的论文选编而成。自1982年至今已经出版14期。

汉语方言学会的秘书处设在语言研究所,李荣、熊正辉先后任会长,1981年至2009年先后举办15届学术讨论会。学会在团结学界同仁,组织方言研究的攻关合作,普及方言学科,扶持新人以及加强本学科的国际联系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后来又先后举办了5届官话方言研讨会,4届方言语法国际研讨会。2007年方言研究室会同全国方言学会又创办了《中国汉语方言学报》。随着方言调查研究的深入发展,还组织了吴方言、粤方言、闽方言、客家方言、晋方言、官话方言等专门方言的定期学术讨论会。

中国语言学会语音学分会是隶属于中国语言学会的二级学会。正式获得批准登记时间为2006年4月。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承办的第三届全国语音学会上,决定成立语音学学会筹委会。发起单位除语言所外,还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中国科学院等多家教学和科研单位。分会负责组织召开两年一次的全国语音学学术会议,编辑出版《中国语音学报》举办各种学术讲座和讲习班。林焘、鲍怀翘先后担任分会主任。

中国辞书学会成立于1992年,它下属的几个专业委员会也先后成立。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是我国成立较早也是规模较大的辞书专业机构,在我国辞书界有较高学术地位,是中国辞书学会的主要发起单位,在学会领导机构中占有一定位置,主管语文词典专业委员会及语文词典评奖工作,协助管理辞书理论和辞书史研究专业委员会。

### 1.3 教学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语言系成立于1978年,2008年9月更名为语言学系,简称语言系。按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集中办院,按所设系,分片教学,统一管理”的办学机制,语言学系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为依托,根据国务院学位办的学科划分标准,拥有汉语言文字学和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两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自主设置二级学科招生专业。

语言学系自主设置的招生专业方向包括:句法与语义学、历史语言学(近代汉语、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学、语音学、应用语言学(机器翻译、中文信息处理)、语言类型学、词典学等。

先后开设课程有:汉语语法学、现代汉语语法、句法语义学、语言类型学、形态句法学、功能语法学、篇章语法、英汉对比语法、语义和语用研究、心理语言学、语用学、话语分析、语料库语言学、语言哲学、形式句法学、形式语义学、近代汉语、中古及近代汉语语法史、汉语史、汉语史专题研究、近代汉语语法和词汇、汉语历史语法、汉语言文字学、训诂学、古代汉语、汉语方言学、汉语方言音韵学、汉语历史音韵学、汉语方言调查、国际音标训练、语音学、实验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应用语言学、自然语言信息处理、机器翻译、词典学等。

先后担任系主任的有:吕叔湘、李荣、刘坚、江蓝生、张国宪、沈家煊、刘丹青。

语言学系自成立以来,培养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67名(其中外国留学生13人);获得硕士学位的研究生83名(其中外国留学生9名)。

## 二 学科发展

### 2.1 现代汉语语法和语义的研究

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是语言所最早起步的学科之一。现代汉语组在最初的两年里,为配合

文化教育的实际需要,以高初中语文课本的材料为主,着手编写供中学师生及一般干部参考用的语法简编。成果就是署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语法小组”的《语法讲话》。自1952年7月起,在《中国语文》上分17次连载刊登。后经补充修订,1961年12月由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书名改为《现代汉语语法讲话》。作者署名“丁声树、吕叔湘、李荣、孙德宣、管燮初、傅婧、黄盛璋、陈治文”。这部书选例精当,分析透辟,以重视语法结构为特色,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代表了国内语法研究的最高水平。

1953-1955年,在吕叔湘的主持下进行“汉语语法体系和术语的研究”。1953-1954年,《中国语文》、《语文学》等杂志上开展了汉语词类问题的讨论,吕叔湘《关于汉语词类的一些原则性问题》(《中国语文》1954年9月、10月号)是对这一问题的理论总结。1957年开始,现代汉语组集中进行句型和动词的研究,由吕叔湘和陆志韦主持。1959年3月号的《中国语文》上,刊登了署名“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小组”的文章,题为《语法研究上要求加强合作》。文章称“本小组计划写一部《现代汉语语法》目前正在做准备工作”。文章提出了作者认为当时还没能很好地解决的53个研究课题,分为9个大类列出。陆志韦指导刘坚、陈建民、饶长溶、王福庭分别就其中的助动词、兼语式、副动词和连谓式问题做专题研究,研究报告先后刊登于1960年《中国语文》第1、3、4、6期上。

1953-1956年,陆志韦主持编写了《汉语的构词法》(科学出版社,1957;修订本1964),参加者有陆志韦、管燮初、蒋希文、任建纯等。该书以北京口语为研究资料,提出了构词研究的“扩展法”,对现代汉语的构词方式进行了具体的分析。

六十年代语法研究在吕叔湘带领下开展工作,系统性地研究汉语句子的组织形式,尝试用“句段结构”对汉语语法做全面描写(范继淹《汉语句段结构》,《中国语文》1985年第1期),可惜这项工作因“文革”而中止。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专题研究有:吕叔湘《关于“语言单位的同一性”等等》(《中国语文》,1962年第11期),《现代汉语单双音节问题初探》(《中国语文》1963年第1期);范继淹《动词和趋向性后置成分的结构分析》(《中国语文》1963年第2期);李临定《带“得”字的补语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范方莲《存在句》(《中国语文》1963年第5期)。

“文革”期间学术研究一度中止。七十年代中期,语言研究所逐渐恢复研究工作,现代汉语组在吕叔湘带领下编写《现代汉语八百词》(商务印书馆,1980)。这也成为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现代汉语研究室”推出的第一项重要的集体研究成果。该书获得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3)。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是基于数十年理论思考的心血之作。这两部作品,在事实描写和理论探讨方面垂范于世,代表了当时国内语法研究最高水平。汇聚吕叔湘一生菁华的《汉语语法论文集》(增订本,商务印书馆,1984)荣获首届吴玉章奖金特等奖(1987)。

八十年代现代汉语研究室的研究重点之一是句型和动词。这方面的代表性成果是现代汉语室编《句型和动词》(语文出版社,1987),李临定《现代汉语句型》(商务印书馆,1986),孟琮、郑怀德、孟庆海、蔡文兰《动词用法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郑怀德、孟庆海《形容词用法词典》(湖南出版社,1991)。语法理论方面的成果有《范继淹语言学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86),杨成凯《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

八十年代后期起,社科院的科研体制转向课题制,语言所的语法研究也开始探索跨研究室的学科整合尝试。1989年,以廖秋忠为召集人的“汉语运用的语用原则”获得国家社会科学

基金的资助,参加者既有国外语言学研究室的廖秋忠、沈家煊、卫志强、赵世开、徐赳赳等,又有现代汉语室的陈平、杨成凯、徐丹等人,研究成果为《语用研究论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这一时期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一个高潮是功能主义方法的成功运用,代表作是陈平、廖秋忠和沈家煊的研究,成果汇集在《现代语言学研究:理论、方法与事实》(陈平,重庆出版社,1991)、《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吴玉章奖金语言文字学一等奖,1997)和《不对称和标记论》(沈家煊,江西教育出版社,1999)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2)这几本书里。

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更为成熟的认知语法、功能语法、语言类型学、语法化研究、词汇语义学和形式句法等研究方向,与国际语言学发展方向全面接轨。2001年,现代汉语研究室更名为句法语义研究室。2002年,以这个研究室为基础的“句法语义学”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学科。

近十几年来,句法语义学科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认知语法研究成果最为突出。对汉语句式问题的集中探讨、对语言主观性和主观化问题的关注、关于汉语“糅合”造句方式的论证、“行、知、言”三个认知域观念在语法分析中的应用,尤其是关于汉语词类与句法成分的阐释,使汉语句法语义中的一些传统难题得到了全新的认识。这方面的成果集中反映在《“有界”和“无界”》(《中国语文》,1995年第5期,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2000)、《复句三域“行、知、言”》(《中国语文》,2003年第3期)、《“王冕死了父亲”的生成方式——兼说汉语糅合造句》(《中国语文》,2006年第4期)、《汉语的名词和动词》(《汉藏语学报》,2007年第1期)等系列论文中。

功能语法研究继承并发展了陈平、廖秋忠开创的方法,用动态的眼光深入考察了近现代汉语口语和书面语的语法事实,成果集中于《汉语功能语法研究》(张伯江、方梅,江西教育出版社,1996,获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0)、《现代汉语语法的功能、语用、认知研究》(沈家煊主编,商务印书馆,2004)、《现代汉语形容词功能与认知研究》(张国宪,商务印书馆,2006)、《从施受关系到句式语义》(张伯江,商务印书馆,2009),以及《指示词“这”和“那”在北京话中的语法化》和《自然口语中弱化连词的语法标记功能》(方梅,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2004)。

语言类型学是九十年代后发展起来的研究方向,出版了第一本基础理论译著《语言共性和语言类型》(科姆里著,沈家煊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一部基于汉语事实的专著《语序类型学与介词理论》(刘丹青,商务印书馆,2003)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2007),第一部跨语言视角的语法研究手册《语法调查研究手册》(刘丹青编著,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把汉语放到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考察”成为句法语义研究的一致追求。

词汇语义研究与词典编纂工作紧密结合。谭景春《词的意义、结构的意义与词典释义》(《中国语文》,2000年第1期,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2002)和《语义综合与词义演变及动词的宾语》(《中国语文》,2008年第2期)用认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词义的产生和变化,给出了词典释义中若干具有可行性的重要原则。

形式句法研究近年来也在扎实地开展。胡建华等在否定与焦点、题元角色等问题上做出许多专项研究(《否定、焦点与辖域》(《中国语文》,2007年第2期);《论元的分布与选择——语法中的显著性与局部性》(《中国语文》,2010年第1期))。

现代汉语语法学术讨论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句法语义研究室和《中国语文》

杂志社联合主办,是中国语言学界历史最长、影响力最大的句法学和语义学专业系列会议。讨论会开始于1981年,至今共举办16次。每次会后辑成的论文集《语法研究和探索》作为“中国语文丛书”也已出版了15辑。本学科参与主办的重要学术会议还有:“句型和动词学术讨论会”(福建厦门,1985年11月);“现代汉语语法专题研讨会”(北京语言学院,1995年12月);“两岸三地现代汉语句法语义小型研讨会”(2007和2009年先后在香港和台湾举行)。

## 2.2 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

“调查国内各地方言和兄弟民族语言”是建所之初的主要任务之一。五十年代初的几年间,语言所的少数民族语文组工作相当活跃。1951年即派出工作队去川康调查凉山彝语,并在西康帮助彝族制订新文字;1952年派出前往云南、广西、贵州的调查组;1953年9月召开的“少数民族语文研究工作扩大会议”及时总结经验以后,1954年又派出了赴广西的僮语工作队。1955年12月,语言所与中央民族学院联合召开民族语文科学讨论会,少数民族语言研究组主任傅懋作了题为《帮助少数民族创立和改革文字工作的情况和问题》的主题报告,会议对民族语文工作的初步计划进行了讨论和修订。1956年4-6月,语言所同其他有关单位共同组成总数700多人的七个调查工作队,前往四川、西康、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对藏、傣、苗、瑶、黎、布依、拿喜、荆濮、侬、侏、僮各语言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语言所与中央民族学院合作编辑了西康彝语、拿喜语、苗语(三种)、瑶语(二种)、仲家语、黎语、僮语、山头(荆濮)语11种语言的教科书。1956年12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这些工作在新的研究机构里得以更广泛地展开。

1955年召开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通过决议,建议“在两年内完成汉语方言初步普查的计划”。1956年制订的《语言科学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草案》提出汉语方言调查是汉语研究的三个中心问题之一,并且指出首先要进行方言普查。1956年3月教育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出了《关于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指示》,随后中央和各省市都相继成立了相关的领导机构,制订了汉语方言普查工作的计划和步骤。方言普查的主要任务是初步调查全国汉语方言的语音状况。为了配合这次普查,1956年,在胡乔木的提议下,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联合举办了九期普通话语音研究班,训练各地高校调查方言的人员。前三期由丁声树、李荣等主讲,后六期由陈治文主讲。语言研究所根据赵元任的《方言调查表格》修订编制了《方言调查字表》(科学出版社,1955),编写了《方言调查词汇手册》(科学出版社,1955),《汉语方言调查简表》(1956),《古今字音对照手册》(丁声树编录,李荣参订,科学出版社,1958),出版了李荣为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编写的《汉语方言调查手册》(科学出版社,1957)。由丁声树撰文,李荣制表的《汉语音韵讲义》(上海教育出版社,1984)是这次训练班的主要教材,一直到现在仍然是方言音韵方面不可替代的权威著作。方言普查积累了丰富的方言材料,增加了方言工作者对汉语方言的全面认识。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普通话语音训练班的培训和方言普查的实际锻炼,培养了大量具有调查经验的方言工作者,改变了以往方言调查研究只局限于少数几个人的局面。这其中的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汉语方言学界的中坚力量,为后来汉语方言调查研究在全国普遍开展,汉语方言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1959年春,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方言组在丁声树、李荣带领下对河北昌黎县的方言进行了调查,其成果就是由河北省昌黎县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合编的《昌黎方言志》(科学出版社,1960)。《昌黎方言志》第一次对一个县的方言进行全面调查,调查点达193个,对语音、词汇、语法都有严格、深入、细致的调查,材料丰富,注意对语言结构的细致分

析。《昌黎方言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写的第一部方言志，它吸收了过去几十年汉语方言调查的经验，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越了此前同类著作。同时，对昌黎方言的调查，也为后来的方言调查积累了丰富的集体工作经验。

八十年代初，方言研究室在李荣带领下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中国语言地图集》的编纂，李荣和傅懋 分别负责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部分。《方言》杂志为配合地图的绘制，组织了一批讨论汉语方言分区的文章，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李荣的《官话方言的分区》（1985年第1期）和《汉语方言的分区》（1989年第4期）。前者把晋语从官话中分立出来，后者把平话和徽语设立为与吴粤闽等方言平行的大区。这些主张在《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社，1987，1990，1993年获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9年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果一等奖。）中得到体现。《中国语言地图集》就汉语方言提出“点—小片—片—区—大区”的层次划分法，取代传统的“方言—次方言—土语”三级区分法，并据此再把汉语方言分为10个大区：官话、晋语、吴语、徽语、湘语、赣语、客家话、粤语、闽语、平话。把官话大区分为8个区：东北官话、北京官话、冀鲁官话、胶辽官话、中原官话、兰银官话、西南官话、江淮官话。闽语大区包括闽南区、莆仙区、闽东区、闽北区、闽中区、邵将区、琼文区7个区。

方言研究室贺巍、张振兴主持的“汉语方言重点调查”（国家“七五”重点项目）选择12处有代表性的方言进行重点深入的调查研究，出版了漳平、洛阳、江永、嘉定、博山、福清、舟山、黎川、武汉等九处方言的研究报告。这些著作有统一的体例，对语音、词汇、语法都有详细的描写，内容丰富又各具特色。

九十年代初，方言研究室参加了李荣主编，全国五十余位方言专家参与的国家社科“八五”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获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及辞书一等奖。）的编纂工作，从1991至1998年，共出版分地点方言词典41本。41个方言点分别是：哈尔滨、济南、牟平、徐州、洛阳、西安、西宁、银川、乌鲁木齐、万荣、太原、忻州、武汉、成都、贵阳、柳州、南京、扬州、苏州、上海、崇明、丹阳、宁波、杭州、金华、温州、长沙、娄底、南昌、黎川、萍乡、梅县、于都、南宁（平话）、广州、东莞、厦门、雷州、海口、福州、建瓯。这些地点几乎覆盖了各主要方言区。每一部词典收词7000至10000条不等，实词虚词并收，并有方言例句，例句中还引用了当地许多的歌谣、谚语、歇后语、谜语等等，反映了当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由于编写者大多数从事方言调查研究工作多年，有过相当的训练，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当地人或在当地长期生活，会说当地方言，因而能做到调查深入，解释词义准确细致。《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分地点词典总字数2000余万，规模浩大，是汉语方言词汇调查研究的巨大收获，对汉语方言词汇的研究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侯精一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现代汉语方言音库”（第四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奖，2002）用有声的形式保存现代汉语方言，为后人留下一份极为珍贵的汉语方言有声资料。其中“概况库”介绍九大方言区的地域分布、历史形成、方言特点、方言分区等；“资料库”有40种汉语方言代表点的资料，每种都包括语音系统、字音、词汇、语法例句和长篇语料。

由张振兴、熊正辉主编的《新中国语言地图集》也即将出版发行。

此外，一些个人研究论著也获得学界好评。如：《客家方言的分布与内部差异》（黄雪贞，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989）、《音标处理系统（YEX）和方言词典自动处理系统（FYCD）》（熊正辉，第二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6）、《福建省顺昌县境内方言的分布》（冯爱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1990）、《客家方言语音研究》（谢留文，中国社会

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2004)、《湖南城步青衣苗人话》(李蓝, 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2005)。

### 2.3 语音学研究

语音室的前身是原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的“语音乐律实验室”, 语言所成立后, 以此为基础, 在民族语文组内组建了语音实验小组。

语音室建立之初, 所使用的实验仪器主要包括浪纹计、乙一和乙二声调推断尺、音叉、渐变音高管以及钢丝录音机。1957年, 为了解国外实验语言学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 吴宗济受国家委派前往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进修, 又到瑞典和丹麦继续进修相关学业。五十年代后期, 语言所花费 2 万美金添置了声学分析仪器, 如频率仪、示波器和语图仪等, 同时, 由吴宗济设计制作了腭位照相装置, 与 X 光照相配合, 开始研究普通话元音和辅音的生理特性和声学特性。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吴宗济提出的共振峰简易算法, 鲍怀翘和吴宗济录制的普通话音素 X 光静态发音资料以及绘制的普通话发音腭位图和舌位图。

六十年代语音研究小组最重要的成果是五卷本《普通话语音实验录》(包括第一卷“总论”, 第二卷“元音”, 第三卷“辅音”, 第四卷“声调”和第五卷“仪器和试验方法”)和《普通话发音图谱》(周殿福、吴宗济, 商务印书馆, 1963)。这一时期重要的成果还有周殿福的艺术语言发音的研究, 林茂灿用自己研制的“音高显示器”进行的单音节和多音节声调的声学实验(《音高显示器与普通话声调声学特性》《声学学报》2 卷 1 期, 1965)。

七十年代后期语音研究室成立以后, 吴宗济等利用语图仪, 对普通话的单音节和双音节展开了大规模的声谱制作, 进行了系统的数据测量和对声、韵、调的声学特性分析。成果集中体现在《实验语音学知识讲话》(吴宗济、曹剑芬等, 《中国语文》1979 年第 1、2、4、5、6 期连载), 《普通话单音节语图册》(吴宗济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 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1993), 以及曹剑芬、杨顺安等就普通话轻声音节、二合元音和复合元音的系列实验研究。

1977 年始陆续进口了丹麦 B. K 生产的 W arm 77 计算机和 3348 实时声谱分析仪, 以及全数字化各类语音分析仪如 7800 语图仪和 4800 分析仪等, 使研究走上了数字化道路。这个时期, 普通话语音声学特性研究全面展开, 基于语音规则的语音合成也已启动。在曹剑芬、许毅等参与下, 杨顺安在计算机上实现了我国第一个基于语音规则的共振峰语音合成系统。在此基础上, 许毅实现了汉语普通话全音节的规则合成, 同时, 祖漪清进行了发音参数语音合成的研究。在吕叔湘先生的指示下, 吴宗济和林茂灿开始了汉语声调和语调的研究。

用实验语音学手段进一步观察传统语音学的“清浊”概念, 得出不同于以往的若干新的发现。曹剑芬发表了《常阴沙话古全浊声母的发音特点》(《中国语文》1982 年第 4 期)和《论清浊与带音不带音的关系》(《中国语文》1987 年第 2 期), 还先后在国际语音学会议上发表“论吴语鼻音声母的发声型对立及其它”等相关论文。1987-1989 年她在美国进修和访问期间, 又系统地考察了吴语浊声母的发声特性, 后来在国际期刊 Journal of Phonetics 上发表了 ‘An exploration of phonation types in Wu dialects of Chinese’ (Vol. 20, No. 1: 77-92, 1992)。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吴宗济、林茂灿主编的《实验语音学概要》(高等教育出版社, 1989, 1993 年获国家教委直属出版系统优秀成果奖)和曹剑芬的《现代语音基础知识》(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0), 以及杨顺安的《面向声学语音学的普通话语音合成技术》(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先后出版。杨顺安的《普通话音节合成系统》(1987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成果奖;

1987年国家重大科技成果奖)、《浊声源动态特性对合成音质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 1990), 在提高合成语音的音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合成出的普通话已接近人的发音, 在国内外处于领先水平。曹剑芬与任宏谟合作翻译的《言语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也成为国内语音学的重要参考读物。

语音室的学术成就引起了国内外语音学界的关注。1979年瑞典著名言语工程师兼语音学家 Fant首次来访; 1982年, 赵元任先生来访, 并在实验室录制了国际音标发音; 1983年美国著名语音学家 Peter Ladefoged来语音室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访问研究, 对普通话合成技术和语音室的研究作了肯定, 并且推荐研究成果在 Journal of Phonetics上发表; 1985年, 东京大学著名言语工程学家 Hiroya Fujisaki首次来访, 此后几乎每年来访交流。

九十年代以来, 语音研究和言语工程的结合不断加强, 语音研究对象从孤立的单音节进入到自然的连续话语, 从单纯的音段研究发展到音段、超音段兼顾, 特别是加强协同发音、语流音变、重音、节奏、语调和韵律结构等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发展更加迅速。吴宗济基于汉语不同于西方非声调语言的特点, 结合语音学范畴的发音生理和发音声学条件、语法学范畴的词句结构条件、音系学范畴的历时与共时语音演变, 提出“跳板规则”、“多米诺规则”、“音系学规律”、“调位守恒”、“移调”、“变域”、“韵律互补”等规则和原则。林茂灿对汉语语调的研究和曹剑芬对汉语节奏的考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突破。这一时期, 语音室在国内外语音学界和言语工程界的地位日渐突出。1992年和 1993年语音室连续两年参加国家 863 语音合成系统的评测, 是唯一一个基于共振峰规则合成的系统。1996年, 语音室开始承担国家 863 项目, 祖漪清和李爱军等提出了汉语的韵律标注系统 C-TOBI和音段标注系统 SAMAP-C。此后, 在语料库的基础上, 语音室开展了连续话语中一系列语音问题研究。

2002年, 语言所成立了“语音与自然话语重点学科”, 学科主要依托于语音研究室和当代语言学研究室。在学科经费和国家专项经费的支持下, 购置了多种语音分析设备和生理研究设备(如电磁发音仪 EMA, 喉头仪 EGG, 动态腭位仪 EPG等), 建立了专用录音室和审音室。承担了国家 863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社科院重点项目以及横向合作课题(包括与 IBM, TOSH I A, NOK I A, MOTO 中国研究中心的合作项目、日本 ATR 合作项目、欧盟项目以及美国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开展了发音机理的研究、自然话语的语调韵律特征研究、藏语语音合成、多风格语音合成研究、情感语音研究、中介语语音一方言和少数民族地区普通话语音以及中国人英语语音问题研究、音段与音段音变的研究、音段的语音实现与超音段的韵律结构的关系研究等。

2007年, 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实验室经费和国家专项经费支持, 2009年建成语音室儿童语言习得实验室, 购置了大量声学和生理专业设备, 邀请了加拿大学者开展了新兴交叉学科儿童语音语言习得的合作研究。

为庆祝吴宗济先生 95 岁华诞, 2004年举办了国际声调语调问题研讨会(TAL, 2004), 来自国内外的 150多名语音学家和学者对语音室的研究水平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出版了英文版的纪念文集《语音学与言语处理前沿 From Traditional Phonology to Modern Speech Processing》(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4 第六届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 2007), 进一步扩大了汉语作为典型声调语言的影响; 2008年 4月第八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暨庆贺吴宗济先生百岁华诞语音科学前沿问题国际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邀请了国内外著名语音学家, 以大会报告和专题的方式, 介绍语音学及相关研究领域的最新动态, 会后出版了由 G.

## 2.4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

汉语史研究组于 1959 年组建, 任务是对古代汉语语法作专题研究。陆志韦、郑奠领导制定了古代汉语语音史、语法史以及词汇史的研究计划, 为古代汉语研究的学科发展作出了前瞻性的规划。规划订出以后, 陆志韦直接领导了汉语语音史的撰写, 制定了《左传》语法的研究计划; 郑奠领导了古汉语语法、修辞研究的资料整理工作, 成果有《古汉语语法学资料汇编》(麦梅翘合著, 中华书局, 1964)、《古汉语修辞学资料汇编》(谭全基合著, 商务印书馆, 1980)。

汉语史研究组其他组员集中于专书语法研究, 成果多在七十至九十年代问世, 形成了古代汉语研究室以古汉语语法研究见长的特色。如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中国科学院, 1953)、《西周金文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 1981)、《左传句法研究》(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何乐士《左传虚词研究》(商务印书馆, 1990)、《古汉语语法及其发展》(与杨伯峻合著, 语文出版社, 1992)、《左传的范围副词》(岳麓书社, 1994)、《史记语法特点研究》(商务印书馆, 2005)、《汉语语法史断代专书语法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 2007); 王克仲《助语辞集注》(中华书局, 1988)、《古汉语词类活用》(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9); 王海棻《马氏文通与中国语法学》(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1) 等等。这些著作对古汉语语法的深入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管燮初《殷墟甲骨刻辞的语法研究》是我国研究甲骨文语法的第一部专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后, 汉语史研究组一分为二。由“文革”前的宋元词汇组部分成员和汉语史组的部分成员组成近代汉语研究室, 原汉语史组的其他人组成古代汉语研究室。

古汉语研究室先后编纂了三部《古汉语研究论文集》(北京出版社, 1982 1984 1987), 汇集了本室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 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由何乐士等编写的《古代汉语虚词通释》(北京出版社, 1985), 也备受学术界好评, 曾获北京出版社 1985 年优秀图书奖; 古汉语室集体编撰的《古代汉语虚词词典》(商务印书馆, 1999) 规模更大、汇集成果更全面。

汉语音韵学研究是七八十年代历史语言学的另一重点, 成果有邵荣芬《汉语语音史讲话》(天津人民出版社, 1979)、《中原雅音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 1981)、《切韵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2)、《经典释文音系》(台北学海出版社, 1995)、《邵荣芬音韵学论集》(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7); 王显《〈切韵〉的命名和〈切韵〉的性质》(《中国语文》1961 年 4 期)、《再谈〈切韵〉音系的性质》(《中国语文》1962 年 12 期)、《清代学者在古韵分布研究上的贡献》(《古代汉语音韵学论文集》1980) 等等, 在汉语音韵学及音韵学史研究上都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绩。杨耐思《中原音韵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1; 首届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 1986) 是音韵学研究中有近代言的力作, 该书的出版推动了对近代音的研究, 在学术界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九十年代后期, 古代汉语研究室呈现语法、音韵、古文字、文献、词汇、训诂多元化配置的格局。如姚振武《现代汉语的“N 的 V”与上古汉语的“N 之 V”》(《语文研究》1995 年 2 3 期) 和《先秦汉语受事主语句系统》(《中国语文》1999 年第 1 期) 获 1999 年度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孟蓬生探讨同源词的专著《上古汉语同源词语音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五届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 2004) 也颇受好评。董琨、姚振武先后主持院 B 类重大项目“简帛文献语言研究”, 该项目结项等级为优秀, 成果《简帛文献语言研究》入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正式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9)。近年来, 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 尤其是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方面, 古汉语室还有一批重要成果。如姚振武的《上古汉语个

体量词和“数+量+名”结构的发展以及相关问题》(《中国语言学》第二辑,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李玉的《秦汉简牍帛书音韵研究》(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董琨的《简周古文字读本》(与刘翔等合著,语文出版社,1989)、《楚系简帛文字形用问题》(《简帛语言文字研究》第二辑,巴蜀书社,2006),孟蓬生的《上博简〈缁衣〉三解》(《上海馆藏战国楚竹书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鄆店楚简字词考释》(《古文字研究》第二十四辑,中华书局,2002)等。

从1998年开始,古代汉语研究室作为主要主办者的全国古代汉语学术讨论会,已连续主办了六届。

近代汉语研究室成立三十多年来,成果丰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文献资料的整理。刘坚从浩瀚的文献史料中辑出有代表性的近代白话语料,详加题解、校订、注释,汇成《近代汉语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1985),是近代汉语研究必读的入门书;在此基础上,刘坚与蒋绍愚主编《近代汉语研究室与北京大学大中文系合编》了《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宋代卷、元明卷)三册(商务印书馆,1990、1992、1995“唐五代卷”获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1993),为本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语料基础。

专书与断代语法研究。吴福祥的《敦煌变文语法研究》(岳麓书社,1996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届青年优秀科研成果奖,1999)是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方面较早的重要著作。由刘坚、曹广顺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近代汉语专书语法研究”已经结项,其成果包括晚唐至明清多部白话文献的专书语法研究著作,已由河南大学出版社陆续出版。由江蓝生、曹广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项目“断代汉语语法史研究”,首次对近代汉语各重要历史时期的语法进行全面、系统的描写、研究,目前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虚词研究。吕叔湘著、江蓝生补《近代汉语指代词》(学林出版社,1984)堪称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里程碑式著作,刘坚等《近代汉语虚词研究》(语文出版社,1992)、曹广顺《近代汉语助词》(语文出版社,1995 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1996)、江蓝生《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 第十三届中国图书奖,2001)也都是这方面研究的突出成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杨永龙等发表了许多有关近代汉语虚词研究的论文,如江蓝生《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中国语文》1999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曹广顺《〈祖堂集〉中的“底(地)”、“却(了)”、“著”》(《中国语文》1986年第3期;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1991)、《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In Honor of Mei Tsur-Lin Studies on Chinese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巴黎,1999 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四届优秀科研成果奖,2002)等。这些文章探源析流,理实兼具,描写细致,分析深入,理论方法和结论都获得了学界的广泛关注。

结构与句式研究。如曹广顺《魏晋南北朝到宋代的“动+将”结构》(《中国语文》1990年第2期)、吴福祥《汉语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年第1期)、赵长才《“打破烦恼碎”句式的演变与发展》(《汉语史集刊》第四辑,2001)等都是有关述补结构历史演变的重要研究成果;江蓝生近年来从构式的角度研究句式的语法化,发表了《“VP的好”句式的两个来源——兼谈结构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5年第5期)、《同谓双小句的省缩与句法创新》(《中国语文》2007年第6期)等系列论文。

语法化研究,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在理论方面,刘坚、曹广顺、吴福祥《论诱发汉语词汇语法化的若干因素》(《中国语文》1995年第3期)是国内语法化研究的重要著作。吴福祥近年来在国外语法化理论引介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如《近年来语法化研究的进展》(《外语

教学与研究》2004年第1期)等,主编了《语法化与语法研究》系列会议论文集。在实证研究方面,江蓝生、曹广顺、吴福祥、杨永龙、李明等发表了众多从语法化视角出发,结合汉语实际的论文,如江蓝生《时间词“时”和“後”的语法化》(《中国语文》2002年第4期),江蓝生、杨永龙《句式省缩与相关的逆语法化倾向》(《山高水长:丁邦新先生七秩寿庆论文集》2006),吴福祥《汉语伴随介词语法化的类型学研究》(《中国语文》2003年第1期;中国社会科学院第六届优秀科研成果奖,2007),杨永龙《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中国语文》2005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2006),李明《从言语到言语行为》(《中国语文》200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语言学家奖,2008)等。

语言接触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中古梵汉接触对译经语言乃至中土汉语的影响和元代蒙古语对汉语的接触影响。前者如曹广顺(与遇笑容合著)《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中国语文》2000年第6期)、赵长才《也谈中古译经中“取”字处置式的来源》(《汉语史中的语言接触问题研究》语文出版社,2010)等。曹广顺(与遇笑容合著)《再谈中古译经与中古汉语语法史研究》(《汉藏语学报》第一辑,2007)全面总结了现阶段中古译经特殊语法研究的成果和方法,阐明了今后研究的方向,对于以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后者如江蓝生《从语言渗透看汉语比拟式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4期)、《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语言学论丛》第28辑,2003),祖生利《元代白话碑文中助词的特殊用法》(《中国语文》2002年第5期),曹广顺(与陈丹丹合著)《元白话特殊语言现象再研究》(《历史语言学研究》第二辑,2009)等。吴福祥《关于语言接触引发的演变》(《民族语文》2007年第2期)较全面地介绍了国外新近的语言接触理论。

历史词汇研究。突出成果是编纂出版了一批建立在长期学术研究基础上的高水平的专书和断代语言词典,包括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1988),白维国《金瓶梅词典》(中华书局,1991),周定一主编、钟兆华、白维国参与编写《红楼梦语言词典》(商务印书馆,1995),江蓝生、曹广顺《唐五代语言词典》(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廖珣英《全宋词语言词典》(中华书局,2007)等。《唐五代语言词典》是刘坚、江蓝生主编的《近代汉语断代语言词典》系列之一,这个系列填补了近代汉语断代词汇研究的空白。

为进一步推进汉语历史语法和词汇学的研究,2003年9月以近代汉语研究室为依托建立了院级重点学科历史语法与词汇学。六年多来,本学科已开展了多项重要课题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学科编辑出版了历史语言学专门刊物《历史语言学研究》(商务印书馆,每年一辑),为本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高水平的学术平台,吸引国内外专家发表最新研究成果,推动热点问题的讨论,促进研究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学科在本领域内的影响力和凝聚力。

## 2.5 计算语言学的研究

1956年机器翻译被列入了中国国家科学工作的发展规划,课题名称为“机器翻译、自然语言翻译规则的建立和自然语言的数学理论”。在这个国家规划之下,语言所从1957年开始了机器翻译研究,作为主持单位与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等单位合作,于1959年成功地进行了俄汉机器翻译系统的实验,这是当时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机器翻译系统之一。随后出版了我国第一本机器翻译学术著作——《机器翻译浅说》(刘涌泉、高祖舜、刘倬,科学普及出版社,1964),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论述汉-外机器翻译中的语言分析方法和系统的研制方法。这个阶段后来被学界公认为我国机器翻译研究的开创期,当时的学术带头人是刘涌泉和刘倬。

经过“文革”十年的停滞,语言研究所的业务工作从1975年开始恢复。在机器翻译研究

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应用语言学研究室先后主持研究和设计了俄-汉、英-汉、法-汉、德-汉等多种语言的实验型和应用型机器翻译系统。比较有影响的系统有:ECMT-78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刘涌泉、王广义、傅爱平等)、JFY系列英汉机器翻译系统(刘倬、傅爱平、李维等)和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王广义等)。其中JFY-3(又称科译一号)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于1989年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同时获中国人民解放军科技进步二等奖,JFY机器翻译系统的语言知识库管理软件于1992年获得首届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优秀成果二等奖,JFY-5(又称高立)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于1993年获得北京市科技进步三等奖,GRA篇名英汉机器翻译系统于1994年获得国防科工委科技进步二等奖。机器翻译的研究是理论方法和工程技术并举的。语言所的机器翻译研究始终注重国内外的语言理论,注重语言工程实践,结合汉语的特点,提出了多种语言分析和生成的方法。譬如:融合结构层次、结构功能和原语译语对比差异的中介成分分析法,以谓语为轴心、语法和语义同步分析的句素分析法,个性规则与共性规则相结合的语言分析生成策略,转换、递归、回溯、超前、动态上下文等语句分析算法,开放式系统的设计方法,机器翻译系统语言知识库的建立,等等。这些方法对我国基于规则的机器翻译研究和开发起到了奠基的作用,在相应的历史时期代表了国内的主流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的工作还涉及计算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的多个领域,包括:中文信息处理、汉语字/词的统计和计量分析、语言规划、术语研究等。近年来,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的工作主要是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专题研究和应用系统的研制,以及语言数据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一方面把自然语言处理作为工程化的应用系统来研究,包括语言模型在算法上的形式化,也包括算法的实现、系统的研制和程序设计。另一方面,建立研究和实际应用中需要的语言数据资源,研究组织和利用这些语言数据的方法和技术,如各种语料库、语言学专题数据库、机器词典等。此外在语言研究手段自动化的进程中,承担了语言所的信息化建设,以及管理信息系统的研制和维护等工作。目前应用语言学研究室承担的社科院重大课题“基于自然语言数据处理的汉语辞书编纂系统”正在进行当中。

在多年机器翻译、语言信息处理研究和语言工程实践的基础上,应用语言学研究室编辑出版了计算语言学学术刊物《语言和计算机》1-3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1986);王广义等参加了七十年代末国家标准《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的研制,该项目于1985年获得国家标准局和电子工业部的国家标准二等奖暨电子工业部优秀科技成果奖;林联合参加了八十年代国家首次大规模汉语字词的统计和分析,统计结果编成《现代汉语频率词典》(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6)、《常用字和常用词》(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5)和《汉语词汇的统计与分析》(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5),后者还获得198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和政策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九十年代初刘倬主持了《儿女英雄传》的词汇数据处理,成果汇集在《儿女英雄传虚词例汇》(语文出版社,1994);林联合在计算机数据处理的基础上主编了《写作措辞参考词典》(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此外,应用语言学研究室还出版和发表了应用语言学和计算语言学的多部专著、论文和工具书,如:刘涌泉等的《机器翻译浅说》(科学普及出版社,1964)、《中国的机器翻译》(知识出版社,1984)、《语言学现代化和计算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应用语言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多语对照语言学词汇》(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和《汉语字母词词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建立了多个面向语言研究和应用目标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如汉语词汇资料数据库、汉语语句自动分析实验系统、《现代汉语词典》系列数据库系统、汉语辞书XML数据库系统和现代汉语语料库系统。

## 2.6 理论语言学的研究

五十年代语言研究所即设置了一个隶属于《中国语文》编辑部的情报资料组,其任务是了解和介绍国外语言研究的动态。1962年2月,在时任副所长赵洵的推动下,语言所组建了20多人的外语研究室,分为两个组:《俄汉详解词典》编撰组和《语言学资料》编辑组。

“文革”后,外语研究室恢复科研工作,1980年更名为国外语言学研究室。1979年和1981年先后出版了两辑《语言学译丛》。其中英国语言学家 J. L. Austin 的“论言有所为”、瑞典语言学家 B. Malmberg 的“方言学与语言地理学”、美国语言学家 D. Bolinger 的“语言学各主要流派简述”、C. J. Fillmore 的“‘格’辨”、N. Chomsky 的“深层结构、表层结构和语义解释”等,全面、深入地介绍了当时一二十年间国外语言学研究的重要领域及其运用的方法论基础。

1983年国外语言学研究室组织本室人员翻译出版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委托捷克词典学家兹古斯塔编撰的《词典学概论》这是国内第一部全面论述词典学理论和各类词典具体编撰方法的著述。1981年由黄长著、林书武、卫志强、周绍珩编译出版由英国语言学家哈特曼和斯托克编辑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该词典的翻译出版填补了国内多年没有语言学词典的空白,尤其对后来国内语言学诸领域语言学术语的厘定和规范起到重要作用。沈家煊翻译的《现代语言学词典》(商务印书馆,2000),是英国语言学家克里斯特尔的名作,在国际上很有权威性,译本为汉语学界理解国外最新概念和术语提供了直接的和准确的帮助。赵世开积极引介和研究以乔姆斯基论著为代表的生成语法理论,先后出版了《现代语言学》(1983)、《美国语言学简史》(1989),主编了《国外语言学概述——流派和代表人物》(1990)等著作。1993年,由周流溪、林书武、沈家煊等译、赵世开校,出版了美国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的《支配和约束论集——比萨学术演讲》。卫志强于1988年翻译出版了苏联社会语言学家什维采尔的《现代社会语言学》,1992年与医科大学赵吉生教授合作,翻译出版了苏联神经语言学创始人鲁利亚的《神经语言学》这是国内第一部关于神经语言学的论著。1986-1987年沈家煊分六个专题系统译介英国语言学家 Levinson 的《语用学》(《国外语言学》1986年第1、2、4期;1987年第1、3期),极大推动了我国语用学的发展。

在理论研究方面,伍铁平在1979和1980年的《外国语》上发表“模糊语言学”的讨论文章,是国内最早运用模糊理论对语言模糊性所做的研究。廖秋忠在国内语言学界开辟了篇章语言学这一新的研究领域,译介了国外最新的篇章语言学成果,并且做了大量汉语篇章语法专题研究,成果汇集在《廖秋忠文集》(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中。徐赳赳在篇章分析方面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文,最新成果为《现代汉语篇章回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现代汉语篇章语言学》(商务印书馆,2010)。顾曰国专攻语用学、话语分析和语料库语言学,主要研究成果发表在国外学术刊物上,突出的有“走出取效行为研究的困境”(国际《语用学》杂志,1993年第20卷首篇)、“多模态文本分析”(国际《篇章与谈话》杂志,2006年第2期首篇)、“从现场即席话语到视频流数据挖掘”(国际《语料库语言学》2009年第4期首篇)。他还参加编写了《语言与语言学大百科全书》(第2版,15卷;Elsevier科学出版社,2005)。

1987年起,国外语言学研究室每两年组织召开一次全国范围的“国外语言学编辑工作研讨会”,自第3届开始,研讨会更名“国外语言学研讨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理论语言学研讨会。自1998年更名为“中国当代语言学研讨会”,扩大为中型国际会议,截至2009年累计召开12届。自2003年起《当代语言学》编辑部隔年召开高层次的“当代语言学圆桌会议”,截至2009年前后召开3届。赵世开1985年在语言所创办的“语言学沙龙”,邀请所内外学者就相

关专题进行研讨,至今已有 277 次活动,成为语言所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 2.7 汉语词典的编纂与研究

语言所词典编辑室成立于 1956 年 7 月。五十年代中期,推广普通话和促进汉语规范化工作提上了日程。1955 年 10 月,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化问题学术会议。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致开幕词,陈毅副总理做了重要指示,语言研究所副所长吕叔湘(与所长罗常培联合)在大会上做《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主题报告。会议提出了编写现代汉语词典的课题,建议中国科学院会同有关部门聘请专家组成词典计划委员会和普通话审音委员会,为词典编纂进行筹备工作。1956 年 1 月中国科学院成立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和词典计划委员会,词典计划委员会由胡愈之、叶圣陶、黎锦熙、魏建功、王力、林汉达、吕叔湘、黄松龄、潘梓年 9 人组成。2 月 6 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其中的第 9 条就是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辑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语言研究所成立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研究组,郑奠任组长,孙德宣、邵荣芬等参与工作。3 月 31 日词典计划委员会召开会议,建议在语言研究所内成立词典编辑室,任务为编写现代汉语词典。词典编写宗旨就是国务院在指示中明确提出的确定现代汉语的词汇规范,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7 月,词典编辑室成立,吕叔湘兼任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为集中人力物力,将当时我国仅有的两个语文辞书的专业编纂机构——新华辞书社和中国大辞典编纂处也合并进来。词典室成立以后,开始做《现代汉语词典》编纂的资料搜集工作。7—9 月,《中型现代汉语词典编纂法》在《中国语文》上连载发表。1958 年开始试编。吕叔湘拟订编写细则。编写人员分成语文、哲社、科技三个组工作。《现代汉语词典》凡例和样稿在《中国语文》发表,广泛征求意见。

1959 年 4 月,成立《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审订委员会,主编吕叔湘审订大部分语文条目,丁声树、魏建功也审订部分语文条目,陆志韦审订哲社条目。年底完成定稿工作。吕叔湘撰写“前言”和“凡例”,院长郭沫若题写书名。书稿分批交商务印书馆排印。《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的审订委员会由 15 人组成:丁声树、黎锦熙、李荣、陆志韦、陆宗达、吕叔湘、石明远、王力、魏建功、叶籁士、叶圣陶、周定一、周浩然、周祖谟、朱文叔。1960 年 5 月,教育部向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和高教厅局发文,指定 149 所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教师参与审订工作。年中,《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分 8 册,陆续印出、送审。

1961 年,丁声树接任词典编辑室主任和《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对试印本修改稿进行通读定稿工作,李荣也到词典编辑室参与看稿定稿工作。1965 年 5 月,《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送审稿印出,分送有关方面审看。年底,根据征求意见对词典进行修改。1966 年春,准备改排一部分,修改一部分,内部发行。书稿送商务印书馆。“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关工作停止。

1973 年,《现代汉语词典》试用本出版,内部发行。1978 年 12 月,《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公开发行。

《现代汉语词典》正式出版以后,修订多次,修订内容表现为增、删、改几个方面,就是增删条目、推行规范、修订释义、修改用例、完善体例、全面标注词类,等等,这些工作都是精益求精、与时俱进的举措,目的是更好地反映语言发展的实际情况,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第 1 版(1974—1978 年,1978 年 12 月出版)。这一版与“试用本”相比有不少变化,增删词语,修订释义,增收 3000 条,收词达 56000 条。修订体例,改变字头排列方式,同音节字头排列由按笔画排列改为按声旁编组异形排列。删除了词条的专科分科标记。第 2 版(1980—1983

年, 1983年 1月出版)在第 1版基础上稍加修改, 以消除“文革”的影响。第 3版(1993-1996年, 1996年 7月出版)修订幅度较大, 增加词语 9000条, 删去 4000条, 收词 61000条。增删释义, 反映改革开放后新词新义, 新事物, 新观念; 贯彻新的异读音审音规范。体例上同音节字头排列改为按笔画排列, 异形词不再有并列的排列方式, 取消了标“口”。因篇幅原因删去四角号码检字表。附录增加了西文字母开头的词。第 4版(2002年, 2002年 5月出版)是一个增补本, 在上一版正文后面增补新词新语新义 1200多条, 用粉页印刷附在正文后面。第 5版(1999-2005年, 2005年 6月出版)是修订幅度最大的一次, 增收词语 6000条, 删去 2000条, 收词 65000条。这次修订在区分词与非词的基础上全面标注词类, 使《现代汉语词典》面目一新, 在规范性、科学性、实用性上又明显提升一步, 在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荣获 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颁发的优秀科研成果奖、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图书奖、1997年新闻出版署颁发的国家辞书奖一等奖、2002年中国人民大学颁发的吴玉章人文科学奖一等奖、2008年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国家政府奖。

词典编辑室还编辑出版了《现代汉语小词典》《现代汉语词典(补编)》《倒序现代汉语词典》等辞书, 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新华字典》原由新华辞书社编纂(新华辞书社成立于上世纪 50年代初期, 1956年 7月, 并入当时的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最初由人民教育出版社于 1953年、1954年出版两个版次。1957年改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称新 1版。此后推出了多个修订重排本。《新华字典》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部以白话释义、用白话举例的字典, 也是迄今最有影响、最权威的一部小型汉语字典, 堪称小型汉语语文辞书的典范。1999年获新闻出版署颁布的国家图书奖最高荣誉奖及辞书奖特别奖。《新华字典》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有极为深远的影响, 对普及全民族的文化知识做出了重要贡献。

1960年 12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第三次扩大会议上吕叔湘所作的《关于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辑工作》报告中提出编写现代汉语大词典这一课题。当时《现代汉语词典》试印本已经印出, 他说:《现代汉语词典》这样的中型词典还不能反映现代汉语词汇的全貌, 我们准备以这部词典为基础, 在若干年内编出一本大型的现代汉语词典。经过多年筹备, 目前有关工作已全面展开。

词典编辑室在编写、修订工作中还进行了学术研究工作。1983年在《辞书研究》杂志上组织《现代汉语词典》编辑研究专辑。1983年 4月在浙江宁波召开《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 编辑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编纂学术论文集》。2006年初, 在北京香山举行《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修订研讨会, 出版了《现代汉语词典》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二)》。词典室编辑人员在《中国语文》《辞书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杂志上发表了多篇研究论文, 对辞书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探讨。

### 三 现状与展望

六十年来, 语言研究所经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 逐渐形成了合理的学科布局, 适宜的人员配置和稳妥的发展规划。几代学人在语言事实的田野上辛勤耕耘, 在语言理论的世界中不断探索, 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但是, 从语言学的社会需求, 从语言学自身的发展需求, 以及从中国语言学与国际语言学的差距、中国语言学与国内其他学科的比较等方面来看, 我们在学科

建设和队伍建设等方面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的地方。

现代汉语的句法和语义研究是语言所历史最长的学科,在语法描写和理论建设方面都有突出的成绩。目前,语言所的语法研究十分活跃,在认知语法、功能语法、语言类型学以及形式句法方面都走在前沿,用法描写工作也在扎扎实实进行中。今后的工作中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来自印欧语的机械观念束缚,探索汉语语法的实质性规律。认知语法在深化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重点从词类类型学角度研究汉语的词类,研究汉语的糅合造句和截搭造句;语言类型学拟从汉语方言语法类型研究入手,研究汉语各大方言语法类型特征及其历史和地域背景,力图全面得出汉语语法形式表现的清单;功能语法重在研究汉语形态句法标记的语用属性,语体特征与语法规律,小句的整合与衔接;形式句法着重于汉语的论元结构研究,语法中的显著性与局部性研究。总之应该着力解决汉语基本语法范畴和基本语法关系的定性问题,为大规模详解语法的撰写打好基础。

汉语方言学科是语言所自五十年代开始着力培养的学科,承担并完成了多项国家与院重点、重大课题。语言所从事方言音韵学研究的学者经过长期的方言调查和文献资料准备,形成了注重方言调查,立足于发展、变化,着眼于解释变化原因、归纳发展规律,并进一步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做理论思考的研究风格。今后将深入调查汉语方言的空白点,以期掌握汉语方言的更多的事实,在此基础上探讨汉语方言语音的构造和演变规律,汉语方言语音和语法之间的关系,建立汉语方言语音数据库;在过去汉语方言 41 部词典的基础上建立数据库,编写汉语方言词汇分类辞典;从汉语方言语法类型研究入手,建立普适于不同方言、语言的语法调查和研究的操作平台,同时注重共时差异与历时演变的结合研究;把汉语方言和书面语历史材料结合起来研究,为汉语历史的分析和解释提供重要的参数和理据;从语言接触的角度研究汉语方言的历史以及演变也是下一阶段汉语方言研究的重点之一,对北方阿尔泰语、藏语和汉语官话方言的接触,壮侗、苗瑶、藏缅和南部方言的接触做进一步的深入调查;在广泛深入方言调查的基础上加强汉语音韵学的方法论研究。

汉语语音的实验研究半个多世纪以来不管在实验手段还是学术理念上都是领先的,近年成立了“语音与言语科学实验室”,目标是进一步巩固语言所在国内语音研究领域的主导地位,并进一步推动语音学和言语科学及相关领域研究的快速发展,把实验室逐步建立成国际知名的语音研究中心。结合学科建设的需要,研究方向的定位将重点围绕现代语音学的三大分支学科,即发音语音学(生理语音学)、声学语音学和认知语音学(心理语音学)相关专业进行规划设置。其中,声学语音学领域的研究,是语言所的传统优势所在;发音语音学的研究在国内起步相对较晚,过去的研究设备和手段都比较落后,近年来购置了一些专门的研究设备,引进专业人才,各项研究工作正在逐步展开;认知语音学领域的研究在国内还刚刚起步,一直是国内语音研究的薄弱和空白领域,急需大力发展。儿童语音习得是语音学与语言习得研究的交叉领域,前景广阔,也已经纳入语音室的学科建设规划,并且相关的研究已经逐步开展。

历史语言学的研究,近年来发展很快,呈现的特点是:语言事实的描写和解释越来越深入细致,从“史”的观念出发,在专书研究或断代研究中,通过数量统计,进行穷尽性研究;在注重句法的同时,更加注重语义研究;在注重描写的同时,更加注重对造成语法演变的机制和动因的探讨;注意语法演变的时间因素、地理因素、社会人文因素等。研究领域不断拓宽,如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尤其是简帛文献语言研究方面特别倾注了精力;再如把汉语历史语法与方言语法结合起来、与相关少数民族语言结合起来从语言接触的角度加以考察,等等。在理论上,除

了秉承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优良传统之外,注意吸收认知语言学、功能语言学的观点,把语法化理论和类型学的方法引入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或者尝试把形式主义语言学的方法应用到汉语历史语法研究之中。逐渐形成了注重材料,立足于发展、变化,着眼于解释变化原因、归纳发展规律,并进一步从历史语言学的角度做理论思考的研究风格。今后的研究将继续沿着这样的方向拓展,同时,加强词汇史和音韵学的研究。

计算语言学和自然语言信息处理的研究领域涉及众多方面,大致可以概括成理论方法、语言系统工程和语言数据处理三个方向。应用语言语研究室今后一段时期的研究工作将以后两个方向为主,一方面开展自然语言信息处理领域的专题研究,研制工程化的语言信息处理应用系统,包括语言信息系统的形式化、算法的设计和实现、系统的开发和程序设计;另一方面建设语言研究和应用需要的语言数据资源,研究语言数据的组织方式和应用技术,建立各种类型的语料库、语言学专题数据库、机器词典和词表。

理论语言学的意识已经渗透在每一个学科的具体研究中。当代语言语研究室以编辑《当代语言学》杂志的任务为主,一方面继承其前身诸刊物积极引介国外先进理论的窗口功能,另一方面突出洋为中用的新功能。一百多年来我国现代语言学的成长和进步跟学习和借鉴西方语言学理论和方法是分不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海内外华夏学子已经形成了具有一定实力的研究群体,由原来翻译介绍国外语言学为主,逐渐转向理智地消化吸收、立足汉语进行独立的研究。《当代语言学》将继续走在洋为中用、中西结合的前沿。

词典编辑工作半个多世纪以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建设起一支成熟的词典编辑队伍,成为继续发展的可靠保障。今后首先要保证几部名牌辞书的进一步完善,同时要顺应广大读者的需要,不断研发新的项目。此外,还将着手现代汉语虚词词典、现代汉语新词词典的工作。进一步完善语料库建设,利用现代化手段补充新语料,辅助修订词典。特别要加强词典学理论研究,重点是探讨规范型汉语辞书编写的理论(包括性质、收词、释义及资料建设等)。

十年以前,在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十年的时候,我们提出:“更新观念已是学科发展之必需。在现代汉语的句法、语义研究中应该更明确地用现代语言学的观点揭示汉语的规律,把汉语置于世界语言的变异范围内来考察,使汉语规律的描写体现出对普通语言理论的贡献价值;在研究对象上,不仅要关心书面语,还应更多地关心生活口语的规律;要突破传统观念的局限。语音研究跟句法、篇章的研究还有广阔的结合地带。现代方言的研究在词汇、语法方面还比较薄弱,突破的关键也在于理论观念的更新,应该在类型学的观念下加强方言间的对比研究。历史语言学在单点研究的基础上,应该加强纵向演变规律的探讨,和横向与方言、亲属语言、其他语言的比较研究。在辞书编纂方面,应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加强词语用法研究。语言学各个组成部分是有机的整体,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尽力拓展、沟通和发展已有学科,还应尽力弥补个别欠缺的分支学科,如社会语言学、人类语言学、心理语言学等都是急需填补的空白。”(《纪念语言研究所成立五十年》,《中国语文》2000年第4期)回顾六十年的历程,尤其是最近十年的发展,我们欣喜地看到,许多目标都已实现或初步实现。尤其是理论观念的更新,在各个分支学科,都开始有了实质性的体现。但是,也有一些重要任务尚未实现,尤其是某些空白依然未能填补。面对新的挑战,我们的任务还很艰巨。在回顾六十年历史的时候,我们应该格外珍惜老一代学者留下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继承他们优良的学风和宝贵的学术遗产,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充分意识到我们在发展中国语言学方面的使命,看清我们的优势和差距,为更好地传承文明、创新理论、服务社会做出中国语言学者应有的贡献。